

探展记

春日的蓬莱水城，丹崖山苍松叠翠，小海水面澄净如镜。谁能想到，这片静谧水域之下，曾沉睡了两艘高丽古船。它们在淤泥中沉寂了五百余年，一朝重见天日，便为我们揭开了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海上交往的神秘面纱。

走进蓬莱古船博物馆，展台上的异域古船虽已残损，却依旧带着岁月的厚重，每一块船板、每一个木栓，都在诉说着当年登州港帆樯林立、商贾云集的繁华。

两次清淤唤醒高丽古船

蓬莱水城的小海，是登州港的核心水域，自建城以来，便见证着无数航船的来来往往。而高丽古船的发现，就藏在对这片水域的两次清淤工程中。

时间回到1984年，蓬莱水城迎来新中国成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清淤。施工人员的铁铲在港湾西南隅2.1米深的淤泥中，触碰到了坚硬的木质结构，随着挖掘深入，三艘古船的轮廓逐渐显现。文物工作者闻讯立刻赶赴现场，可彼时工程已近尾声，时间和人力的限制让考古工作难以全面开展，最终仅清理发掘出最为完整的蓬莱1号古船，另外两艘古船只得暂时回埋于港内，其中便包括后来震惊中外的蓬莱3号高丽古船。而这次仓促的发现，为21年后的重大考古成果埋下了伏笔。

2005年，蓬莱水城小海清淤工程再次启动，省考古研究所、烟台市博物馆、蓬莱市文物局组成联合考古队，一场对水下文物的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考古队员踩着淤泥，小心翼翼地清理水下遗迹，时隔21年，当年回埋的古船终于重见天日。

“第二次清淤过程中，我们共发掘出三艘古船！”蓬莱阁景区管理服务中心文物部副部长刘莉介绍，随后工作人员将它们分别命名为蓬莱2号、3号、4号古船，经专家鉴定，其中的3号、4号并非中国古船，而是来自朝鲜半岛的高丽船。“这是中国境内首次发现外国古船，消息一出，立刻震动了中外考古界。”刘莉说。经测量，蓬莱3号古船残长17.1米，其北部数十米处发现的4号古船，虽仅残留中央底板、左右底板和零星外板，残长8.4米，残宽1.96米，但其典型的高丽造船工艺特征，依旧让考古专家眼前一亮。

从1984年的偶然发现，到2005年的系统发掘，两艘高丽古船在蓬莱水城的淤泥中沉睡五百余年后，终于重见天日。它们的出土，不仅填补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的空白，更让登州港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北方起点的地位，有了最直观的实物佐证。

千年海路的重要枢纽

为何高丽古船会沉于登州港的淤泥之中？答案其实藏在登州港千年的历史里。蓬莱古称登州，扼守山东半岛最北端，濒临渤海、黄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天生便是海上交通的要冲。而登州港能成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成为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海上交往的枢纽，既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更离不开数千年的历史积淀。

早在史前文化时期，山东半岛的先民便乘着简陋的舟船，沿着登州水道，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展开了最初的文化交流。战国时期，这里已是齐国通往朝鲜、日本的出海口；秦汉时期，海上交通更是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唐神龙三年（公元707年），登州治所迁至蓬莱，登州港正式定名，一跃成为中国北方海上交通的中枢和对外交往的主要口岸，与南方的广州遥相呼应，共同构成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南北两翼。

《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唐代七条对外通商路线里，海路仅有两条，南方为“广州通海夷道”，北方便是“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这条航线从登州港出发，经庙岛群岛连成的登州水道，抵达辽东半岛后再通往朝鲜半岛，是当时北方最重要的海上通道。

刘莉介绍，登州港的繁华在唐代达到顶峰。彼时，朝鲜半岛的遣唐使百余次在此登陆，日本的遣唐使也有6次从这里上岸，再经山东半岛前往长安。为迎接远道而来的使节，唐朝在登州城内修建了“新罗馆”，宋朝还又设“高丽馆”，这些专门的接待机构，见证着当时登州港作为国际港口的包容与开放。据史料记载，仅明清时期，经由登州港往返中国的朝鲜半岛使节便达上万人，民间的贸易往来更是络绎不绝。中国的丝绸、冶铁、造纸技术经此



蓬莱古船博物馆的主体基本埋于地下，地面仅保留船体和古船台展示场。



高丽镶嵌青瓷菊花莲瓣纹碗

传入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的马匹、木材、人参也顺着这条航线来到中国，大海之上帆影点点，往来的航船载着货物，也载着文化，在两地之间架起了一座交流的桥梁。

宋代中期之后，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登州港的军事功能逐步强化。宋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为防御契丹族南侵，朝廷在天然海港的基础上建立“刀鱼寨”，设水军机构“刀鱼巡检”，登州港逐渐成为重要的水军基地。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朝廷又利用刀鱼寨旧址，修建葫芦形的“小海”，环筑城墙建成“备倭城”，也就是如今的蓬莱水城，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此镇守，操练水师。即便军事功能日益突出，登州港作为南北贸易和对外交往枢纽的地位，从未动摇。

千百年间，登州港既是“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的商贸大港，也是“旌旗猎猎，战船列阵”的海防要塞，它见证了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也承载着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兴衰。两艘高丽古船沉于此，便也有了合理的答案——它们或是往来贸易的货船，或是承载使节的航船，因船蛆蛀蚀、船体受损，无法再远航，最终被遗弃在这座熟悉的港口，在淤泥中沉睡至今。

见证两地技术互鉴

走进博物馆，站在蓬莱3号古船的展柜前，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这艘古船的造船技艺。它是一艘典型的高丽古船，却又融入了鲜明的中国造船技术，这种独特的“混搭”风格，在中外已出土的古船中均属首次发现，成为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技术交流的最直接见证。

刘莉说，考古专家判定蓬莱3号、4号古船为高丽古船，是基于船材、工艺、结构等多方面的证据。与中国古船选用松木、杉木、樟木、楠木等多种木材，根据船体部位按需搭配不同，高丽古船的一大特点是船材单一，蓬莱3号古船通体使用宽大的油松木，仅木钉采用栗木和橡木，4号古船也同样以粗壮的松木为主要船材，这与朝鲜半岛传统造船用材习惯高度一致。

在造船工艺上，两艘古船更是带着鲜明的高丽印记。蓬莱3号古船的船底板由中央底板、左右底板3列宽厚木板构成，由17只“木栓”贯通连成一体，这种木栓连接工艺，是朝鲜半岛古船从独木舟时期便延续的传统，在已发掘的中国古船上从未出现。其外板采用的鱼鳞式搭接方式，木钉从船壳外面钉进舱内的固定方法，也与朝鲜半岛传统造船工艺如出一辙，与中国古船“舱内钉钉，保护铁钉不被海水腐蚀”的工艺形成鲜明对比。蓬莱4号古船虽残缺，却也保留了高丽古船的核心特征：船底板用木栓连接，在中央底板前端直接开槽安装桅杆，而非中国古船的桅座结构，这些典型的工艺特征，让其高丽古船的身份无可辩驳。

“更令人惊喜的是，蓬莱3号古船并非单

纯的高丽古船，它身上还深深烙印着中国造船技术的痕迹，成为造船技艺交融的活化石。”刘莉介绍，传统的高丽古船采用未经加工的原木加强船体横向强度，水密性极差，而蓬莱3号古船内却残存着数道横舱壁，这正是中国古代造船的核心技术——水密舱壁技术，能让船舱即使部分船舱进水，也不会立即沉没，极大提升了航行的安全性。

朝鲜半岛已出土的高丽古船均无桅座，直接在船底板凿孔安装桅杆，这种方式极易损害船底强度。而蓬莱3号古船却清晰可见首桅座和中桅座，两个桅座由松木制成，与舱板、船板用铁钉钉连，这种结构设计，正是借鉴了中国古船的桅座技术。此外，3号古船在中心龙骨板接头处，用宽大的补强材料加固并以铁钉钉牢，这种特殊结构，在朝鲜半岛出土的高丽古船中从未出现，是典型的中国造船工艺。

一船融两艺，这并非偶然。千百年间，两地的造船工匠沿着海上航线相互交流，彼此借鉴，中国的水密舱壁、桅座技术传入朝鲜半岛，推动了当地造船技术的进步，而朝鲜半岛的木栓连接、鱼鳞式搭接工艺，也为中国造船业提供了参考。这种技术的互鉴与融合，也让我们看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不仅是货物的贸易之路，更是技术的交流之路。

一同出土的还有船舱内的两件高丽粉青沙碗，一件饰有水波联珠纹，一件为菊花莲瓣纹，青釉之上镶嵌白色纹饰，带着鲜明的朝鲜半岛风格。经专家鉴定，这两件瓷器为14世纪后期至15世纪朝鲜半岛的典型器物，它们的出土，为朝鲜半岛作为古代东亚瓷器出口区域以及与中国在陶瓷领域的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依据。

作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珍贵遗存，蓬莱3号、4号高丽古船的出土，为研究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交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中国古代造船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难以估量。

在此之前，中国各地虽已发现百余艘古代船只，但从未有过外国古船的身影。高丽古船的出土，填补了这一空白，让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中国船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晓春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蓬莱沉船以及出土的文物证明了登州不仅是中国东北海域重要的港口，而且是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交往密切的对外贸易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东北方向的始发港口。”

高丽古船的存在，直观印证了登州港作为古代中国北方与东北亚各国海上交往枢纽的地位，证明了唐代以来“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的真实存在，也让史料中记载的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海上往来，成为可以触摸的历史。它们不仅是岁月的沉淀，更传承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如今，这份精神依旧在两地延续，而它们也将在岁月的长河里，继续为我们勾勒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生动脉络。



蓬莱3号古船发掘现场

200年前的“海鲜地图”
如何描写“开凌梭”？

文脉齐鲁

□ 本报记者 从春龙

“春吃开凌梭，鲜得没法说。”眼下正是胶东一带吃“开凌梭”的时候。经冬的梭鱼，一冬禁食，腹净无腥，肉质雪白细嫩，鲜得纯粹。酱焖最是地道，鱼肉嫩而不散，汤汁浓郁入味，一口下去满嘴海味清甜。可以说，“开凌梭”是烟台人开春最盼的一口鲜，错过就要再等一年。

其实，早在200多年前，清代栖霞学者郝懿行的《记海错》里，就曾鲜活地描写过“开冰梭”：“其形与鲷鱼同，唯目作黄色为异，当是一类两种耳。其肉作脍并美……今登莱海上，冬春间多有之。”又言：“梭鱼出文登海中者佳，以冰泮时来，彼人珍之，呼‘开凌梭’。”

除了梭鱼，这本“海鲜地图”还详细写了加吉、鲅鱼、鲍鱼、海参、对虾、蛏子等海鲜，让胶东海鲜的记忆跨越时空，成为承载乡愁的文化密码。

郝懿行（1757—1825），字诂九，号兰皋，山东栖霞人，是清代乾嘉学派中极具影响力的经学家、训诂学家。他出身栖霞望族，自幼刻苦求学，以“新奇之书悦目，义理之味养心”自勉。27岁拜济宁举人李承箴为师后，郝懿行的学术突飞猛进，42岁中进士，授户部额外主事。这是一个挂名闲职，他一待便是20多年。仕途平淡的郝懿行淡泊名利，将大量精力投入著述，在京师的“打头小屋”中孜孜不倦钻研四十余载，留下《尔雅义疏》《山海经笺疏》等三十余种著作，辑为《郝氏遗书》，其中《尔雅义疏》更成为清代雅学研究的巅峰之作。

栖霞并不靠海，郝懿行能完成《记海错》，离不开妻子王照圆的协助。王照圆是福山人籍的才女，两人不仅是生活中的伴侣，更是学术上的挚友，常一同校勘古书、探讨经义。

福山是著名的“鲁菜之乡”。明清时期，大批厨师享誉北京，此后福山厨师在国内外各处开店，遂使福山菜风味传遍天下。从福山走出的王照圆，自小对各种海产有着真切了解，为郝懿行提供了诸多参考。后来，学界将他们的与高邮经学家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并列，留下“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的美名。

《记海错》是古代山东唯一专门辨识海洋生物的专著。书名“海错”取自《尚书·禹贡》“海物惟错”，意为海中错杂繁多的生物。彼时郝懿行身居京师，远离胶东故土，冷链物流的缺失让新鲜海产难以抵达，对家乡的思念便化作笔下的鱼虾蟹贝。他在自序中坦言：“余家近海，习于海久，所闻海族亦孔之多。游子思乡，兴言记之。”

这部作品是郝懿行在闲暇时完成的“大家小书”，全书仅一卷，详细记载了49种胶东沿海常见的鱼类、贝类、藻类等等，堪称200多年前的“海鲜地图”。

作为训诂学家，郝懿行在《记海错》中展现了严谨务实的治学风格。他摒弃古代典籍对海洋生物的神秘化记载，坚持眼见为实，书中所记均为与民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常见品类。写作时，他既依托早年对胶东沿海海产的观察记忆，又援引《太平御览》《临海水土异物志》等近三十种古文献，将古籍记载与实际情况进行对照考证。他考证出《文选》中的“蜃蛤”就是登莱海边的“八带鱼”，纠正了《临海水土异物志》中“海参有三十足生于背”的错误，指出那些实为海参背上的肉刺。这种“举乡里之称名，证以古书”的方法，让书中内容既具学术性，又有实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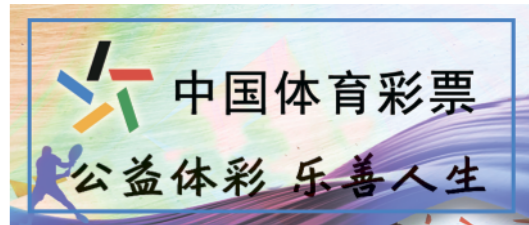
书中对每种海产的描述细致入微，兼具科学性与生活气息。对于胶东名产加吉鱼，他称之为“嘉鱼”，考证其古字渊源，描述其“厥体丰硕，鳞鳍赭紫，尾尽赤色，啖之肥美”。他还提及用加吉鱼头骨制作“加吉孩儿”的习俗，这一习俗至今仍存胶东流传。对海肠的记载更为生动，不仅描述其“形如蚯蚓而大，长约尺许”的形态，还详解其“穴于深海之底沙中，习性，以及‘去其血，阴干其皮，临食以温水渍之’的保存食用方法，尽显古人保存鲜味的生活智慧。书中记载海肠“或遭风浪，漂断游肠，栖泊岸边，为人所得”的场景，与今日黄渤海新区海域大风后人捡拾海肠的画面惊人相似。

凭借严谨的考据和白描的笔法，郝懿行还写出了海产品活色生香的一面，读来让人“唇齿留香”。书中提到的“虾蟆鱼”即黄安康鱼，“福山海中，尝有举网得之者，初不敢啖，投之砂碛，人或收而煮啖之，风味甚佳，清美如蟹。”关于虾，书中记载：“掖地海虾，初春捞取之，大者不盈寸，煮熟浸之，以盐及姜醋食之，或炒食，并佳。及晚春，则其子已出，不宜食矣。”这与号称“莱州第一鲜”的桃花虾完美契合——这种莱州湾的春季限定美味，每年3月-4月桃花盛开时上市，鲜香可口。关于牡蛎，书中记载：“凿破其房，以器承取其浆。肉虽可食，其浆调汤尤美也”，读来让人口水满溢。文登海中的小蟹“大小如钱，厚逾半寸，宜急炙，连骨啖之，味极脆美，彼人所谓独脍者也”。“独脍”大概便是今日胶东海边人说的“嘟噜子”。每年冬春、烟台、潍坊等地都会出现控“嘟噜子”的大军，用高度白酒醉腌入味，鲜美无比。

书中还不乏有趣的记载与典故。“水母目虾”讲的是水母与虾共栖，因水母没有耳目，常与虾相伴，虾遇人惊慌逃走时，水母也能得到警示，随之没入水中。这种共生关系后来演化为成语，比喻人没有主见，人云亦云。关于“西施舌”的由来，《记海错》考证“谓之舌者，有肉突出，宛如人舌。啖之柔脆，以是为珍”。书中还记载了通州人刘桐村任即墨知县时的故事：上级官员多喜爱西施舌，想要品尝，刘桐村认为迎合上级会损害百姓利益，便委婉拒绝。后来历城知县拿出五十两银子托人采购以献上级，刘桐村得知后也未同意，尽显其不畏强权、体恤百姓的品格。

如今，《记海错》已被译注出版，成为研究山东海洋水产及海洋文化的重要文献。上世纪80年代，烟台市编修《水产志》时便引述此书，其对黄渤海水产业的记载，为后世研究北方沿海鱼类资源演变提供了珍贵参考。

这本诞生于嘉庆年间的“海鲜地图”，不仅让现代人得以窥见古人眼中的海洋世界，更让我们读懂了乡愁的味觉密码。20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春日咬下一口开凌梭，或在冬夜啜饮牡蛎汤时，或许正与200年前那位在京师寒窗中思念胶东海滨的学者，共享同一份鲜味与怅惘。由此可知，郝懿行用笔墨留下的，不仅是胶东海鲜的记忆，更是一份跨越百年、历久弥新的文化乡愁。



轨上博物馆：且乘东风载玉行

文物志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它从万年的时光中走来，带着大地的体温与魂魄。从巫觋手中通神的灵物，到帝王腰间权柄的象征，再到君子案头道德的化身，玉器贯穿了中华文明的整个脉络。这不仅关于石的打磨，更是关于心性的雕琢。如今，“好客山东·齐鲁1号”文物研学主题旅游列车缓缓启程，带着这些温润的精灵穿越城市，驶向烟火。

踏入“玉”篇章车厢，可以看到来自济南市济阳区博物馆的俏色玉鱼鹰相关元素。这件玉鱼鹰出土于古老的徒骇河河畔，那里是西周连续国君的家墓地，出土的玉器数量多达94件，堪称“西周玉器宝库”，相传孔子曾到访

过这片土地。俏色玉鱼鹰通长5.2厘米，通宽3.6厘米，厚仅0.6厘米，三千年前的工匠顺着石材天然的色泽，浅色处雕鹰，深色处琢鱼，让鱼鹰捕食的瞬间永远定格。有趣的是，“鸟衔鱼”这个延续数千年的纹样题材，在国家博物馆那件6000年前的彩陶缸上同样耀眼——傲娇的白眼鸬叼着肥美的鱼。千年呼应，在此刻的车厢里悄然回响。

牙璋是玉璋的一种，始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最早出现于山东龙山文化，因此有学者认为牙璋发源于山东地区的大汶口及龙山文化区域。早期牙璋是祭祀祈年的礼器，后期发展成象征王权的礼器。来自五莲博物馆的玉牙璋，通长33.5厘米，牙宽6.8厘米，器型呈扁平状，下有一方形短柄，柄部正中有一穿孔，短柄与器体结合处两侧各有一突出于体侧的阑；刃部较宽，一侧较尖锐，刃内呈弧弯月形。这件牙璋出土于五莲县上万家沟的半山腰，

从其出土位置可以推断出当时人们很可能用它来祈年，祭山，属于代表上层社会最高权力的玉器。怀着对天地的敬畏，先民将玉磨成器，让玉从工具升华为与神明对话的信物。那挺拔的造型、流畅的线条，是远古先民对宇宙秩序最初的描摹。

山东博物馆的兽面纹玉铸引人驻足。它通长17.8厘米，通宽5厘米，厚0.5厘米，上半截白，下半截绿，曾断成两截各自埋在土里“修炼”，岁月赋予它独特的沁色。玉铸的前身是史前石铸，石铸可用来砍伐、加工木料，后来“转型”为礼器，较宽一端还保留着锋利的单面斜刀，那是它曾经的“劳动印记”。玉铸正反两面刻着完整的兽面纹。兽面纹在战国时期被称为“饕餮纹”，现代则被命名为“兽面纹”。饕餮纹是青铜器的代表性纹样，然而饕餮纹从何而来，至今仍是个谜。这件玉铸的发现，为寻找扑朔迷离的饕餮纹源头增添了一线光明。